

物之难矣，小大多少，
各有怨恶，数之理也。
——孔子

■ 杜贵晨 著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门 吕 肖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
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周易·说卦》

齊魯書社

杜贵晨 著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杜贵晨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1

ISBN 7-5333-1550-2

I. 数... II. 杜... III. ①文学评论—理论研究
②古典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06②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9886 号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杜贵晨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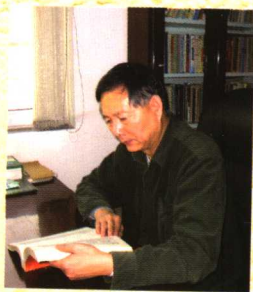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5 印张 2 插页 4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50-2

K·478 定价: 30.00 元



杜贵晨 山东宁阳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短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先后任教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小豆棚》（校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李绿园与〈歧路灯〉》、《中国古代小说散论》、《剪灯三话》、《“三”与〈三国演义〉》、《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明诗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序

我与贵晨相识有二十多年了。我和他都是在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的,虽说不在一个学校,交往也算不上密切,但专业相同,研究方向一致,都偏重在中国古代小说方面,少不了时常有些往来,彼此是比较熟悉的,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

二十多年来,贵晨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屡屡有专著、论文发表,成就甚为可观。凡是我感到有兴趣的,也就是我做小说研究理应注意的题目,我大都浏览过,有的认真地阅读过,给我的印象是贵晨治学非常勤奋,认真钻研,用心甚细,每每于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扶出问题来。凡所考论,大都是他认真研讨过的富有探索性的所识所见,并且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

就我比较关注的《三国演义》的研究来说,它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等名著,近世研究论著甚多,难以有所突破和超越,贵晨却仍然相继做出几点有意义的考论。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问题,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研究者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将当时新发现的《录鬼簿续编》里记载的罗贯中径直视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不计较《录鬼簿续编》中并没有说罗贯中作有《三国演义》。贵晨经过对

照、分析,揭出其间并不相吻合的地方,认为将两者判定为一人,缺乏实在的证据,遂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自然,事情比较复杂,由于文献的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得出肯定性的或是或否的结论,要真正解决这个历史疑案,还有待于发现新资料,作进一步的研讨。而贵晨提出这个问题,正有着引起研究者要正视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讨的积极意义。

再是关于《三国演义》基本成书的年代问题,也有多位研究者做过考证,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也曾经从嘉靖刊本中所引诗赞的作者、小注中的地名注释等几个方面推定这部小说基本成书于元末,并且自信一条注释“治头大祭酒”为“即万户侯之职”的小注,是非元人不能如此注释,小说当成书于元代的铁证。贵晨广泛博览,于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里抉出“吊白门”一则文字,对其中所引元人陈孚的《白门》诗、张宪的《缚虎行》诗以及又从张宪的《玉笥集》检出了《南飞鸟》一诗,综合起来做了深细入微的分析、辨证,推定《三国演义》基本成书的下限为元泰定三年(1326年)。贵晨的这番研讨,不仅提供了以前研究未曾使用过的、已出版的《三国演义研究资料汇编》未收载的新资料,为这部小说基本成书于元后期之说补充了新的证据,而且还为进一步研讨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新思路:元人的诗文中可能还储藏着有助于解开这个历史谜团的材料,有待于研究者发掘、解析。

三是《三国演义》成书的特点问题,研究者大都是称之为“积累型”,论其成书大都要历述以往数代的有关史籍、平话、戏曲。就题材说,《三国演义》自然与《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有许多先出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作品,写作有所依据,谓之“积累型”并无不妥,对先出之各种作品进行考察,也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这还只是小说成书的一个方面,还没有揭示出各部小说的作

者是怎样处理以前的那些材料,也就是作者如何接纳、整合、熔铸和写定如此这般的小说文本的,而这却是关系到对一部“积累型”小说的创作性质的认定,也会影响到对它的内容和艺术的理解、诠释。贵晨在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问题的研讨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为题,突出论述了罗贯中创作的主体感情因素,从而认定《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尽管这还不是正面地考察罗贯中是怎样接纳、熔炼前出之材料,独自写定这部小说文本的,“文人创作”四字也还显得太宽泛,但突出显示了作家的主观感情因素,也能够补偿“积累型”说之偏失,有益于对《三国演义》的内容和艺术的理解、诠释。

贵晨近年治学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是提出了“数理批评”,并做出了理论研讨和谦称为“尝试”的批评实践。这本即将付印的书的上编收入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论文。我也是贵晨在文章中说的对文学作品专注“形象”批评的人,从不关注文学作品中写入的那些数字,或者说是只依照那些数字的本意来理解,对通俗小说中的一些含有神秘性的数字的隐喻义以及那些数字是怎样带有隐喻义的,不理解,也不去追究。坦白地说,我也缺乏弄通这种问题的学识。所以,我读贵晨的这些论文,感到颇有意思,颇有收益,很有意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应当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宇宙万物都是以一定的量的状态存在着,所以上古先民很早就有了数的观念,由直接经验的事物之计数,推行到天象历数的推算,数成为说明、认识客观世界的起点。在上古哲人的头脑中,数是头等重要的理念、方法。《周易》便是以象数卜筮人事之吉凶,后来的《易传》糅合进阴阳、五行之说,加以发挥,特别在汉

代“天人感应”说的笼罩下,象数易学更偏离了事物的经验性质和数的自然属性,揉进了神学的内涵,“数”成了“天数”、“命数”之简称,若干数字也成了神秘的定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智力的增高,汉代的象数之学逐渐衰亡,但却为道教用以作为演绎其教义的理论支柱,还渗透进世人的知识、信仰的意识中,自然也要进入文学的构思和文学作品中。文学批评自然也应当加以诠释,不能完全置之度外,不予关注,不进行探究。

贵晨多年精心研讨,确实多有创获。古人重数,多“倚数”结撰,他总结出了“倚数称名”、“倚数谋篇”、“倚数行文”等类,追根溯源,实出于上古哲人“举措以数,取与遵理”、“参天两地而倚数”的理念。“三”数之广泛运用,从古代小说中总结出“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三事话语”等类,触及到了小说叙事内外多层结构机制,并析出其根源为上古哲人的“三而一成”的数理观念。这样的一些论述,对理解、诠释古代小说创作的深层机制,无疑是颇有意义的,而且有助于通过小说的创作看出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特征。不仅是我觉得给了自己许多启示和知识,众多的文学研究者也会感到有兴趣,从而予以关注。

我还觉得,贵晨现在已做的研讨还主要是揭示出了古人的数理观念在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中的渗透和体现,说明无论名篇、布局,还是叙事、行文,都摆脱不掉古人的数理观念的制约,这也就使其“尝试”性的实践限于说明、印证,还有待于深入文学性的批评。譬如说诗人作家都免不了写入作品许多数字,而命意、性质、意义却不一致:有的是据生活实际而写,无论是确数还是约数,都不含别的意思;有的是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古代象数学中的某个或某些数字,自觉使用和不自觉使用,用意又有不同;有的是作者有意为之,寄寓着某种意旨、情趣,借以表现某种

特定的倾向性。这种种差异就显现出作者用数的性质和创作的境界的差别,一律归之于“重数”的传统而不做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说是尽到了批评的职责。但是,这也正好说明贵晨提出的“数理批评”和所做的“尝试”实践是很有意义的,说明它还有拓展和深化的无限空间。

袁世硕

2005年11月3日

自序

这是拙著继《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之后的又一本论文集，收文主要是2001年下半年以来至今四年间所作，曾发表过的大都作了修订补充，有的为重写，有的是新稿初次发表。

全书各篇论题与写作多与前集有关，而如书名所示，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数理批评”，基本上是“杜撰”；二是以古典作品为主的“小说考论”，或质疑旧说，或提出并尝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尽管二者都主要是就小说著论，但前者偏于说文学普遍之理，后者重在论小说具体之事，故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诸文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研究，接续前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教时对“三复”情节等文学数理问题的思考，在先调河北大学、后又调山东师范大学至今的期间写成，包括“文学数理批评”的立论与阐发和主要是以《西游记》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的尝试。这在总体上大概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工作，有没有或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近年来确有海内外学人择其以为可用者如“三复情节”等，用于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似表明笔者所谓“文学数理批评”尚有可取之处，从而有成立与发展的前景。然而笔者深知自己没有这种理论创新的能力，即使偶尔言有所中，也至多是提出了问题，而问题的深入讨论与解决，则是一项需要更多学人共商共

建的理论事业。因此汇编诸文作集中的展示,虽不乏敝帚自珍之意,但更多的是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好的批评与探讨,以促成“数理”与“形象”批评互补的文学理论与研究的模式。

下编诸文大都与上编各篇在同期写成,内容则侧重在古代小说作家、作品具体问题的考论。内容往好处说是涉及较广,但专家看来可能是杂,却也有若干思考的重点,包括从《三国演义》一书的内、外证论罗贯中的著作权和罗为山东东平人,从常识和学理的角度“颠覆”百年来对《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的误用,从对旧有资料的进一步分析补证拙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说,从艺术的情感标准与世界文学通例论“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从习见程晋芳《怀人诗》的考辨发现《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为塾师,而周进形象正有他本人的一点影子……如此等等,虽千虑未必一得,但在这样的思考中领略存在的孤独,也是一种难得的快乐。

诸文陆续写成于笔者辗转齐鲁、燕赵间教书之余。近年来全国学术的发展特别是曲阜、保定、济南三地高校师生的优良学风都给我以有益的影响,是值得纪念和感谢的!然而车轮滚滚,风尘仆仆,都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更无补于文章。从而本书诸文原不免多有疏漏,即使这次结集又作了修补,也一定还会有不妥、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袁世硕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感谢冯其庸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齐鲁书社官晓卫社长、黄伟中总编辑等领导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责编李军宏女士所付出的辛劳,感谢多年来在诸文写作、发表过程中远近师友所给予的各种帮助!本书倘略有可取,当与各位分其微荣!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八日宁阳杜贵晨于济南历下

目 录

序	袁世硕(1)
自序	(1)

上编:数理批评

理论篇

中国古代文学的“倚数”传统与数理美	
——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	(3)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	
——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33)
中国古代文学的“三事”话语	(55)
“天人合一”与古代小说的三点式布局	
——以《三国演义》为例	(74)

应用篇

《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	(81)
《西游记》数理机制论要	
——从神秘数字出发的文学批评	(97)

《西游记》“悟空”论	(118)
《西游记》的“七子”模式	(129)
《西游记》的“七复”模式	(138)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148)
“孙悟空”名义解	(154)
说“如意金箍棒”	(165)
说“一藏之数”	(174)
说“十万八千里”	(183)
唐僧的“紫金钵盂”	(191)
“三而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	(197)
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 ——以《狂人日记》为例	(214)

下编:小说考论

三国演义

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著作权问题 ——与张志和先生商榷	(233)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 ——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	(250)
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 ——论《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资料当先悬置或存疑	(261)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271)

《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

——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

..... (285)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297)

“刘备摔阿斗”论 (319)

《三国演义》与山东 (324)

从“木船借箭”到“草船借箭” (339)

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之我见 (344)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新议 (355)

吴敬梓“设帐”与周进“坐馆”

——从古典文学的“问题意识”说到名著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 (372)

评《由〈儒林外史〉引起的一场风波》

——与孟醒仁、孟凡经先生商榷 (381)

歧路灯

《歧路灯》的十大长处 (391)

值得一读的教育小说——《歧路灯》 (401)

《歧路灯》的结构 (410)

从《歧路灯》和《红楼梦》看它们的时代 (419)

赞海上两吴女士的《歧路灯》研究

——从我国大陆的《歧路灯》研究说起 (425)

其他

略论儒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438)
宋元志怪传奇略说	(459)
宋元话本略说	(465)
“三言”述论	(470)
《醒世姻缘传》浅论	(493)
《豆棚闲话》本事三则	(504)
武松的籍贯和打虎处	(507)
任明华《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序	(511)

上 编

数 理 批 评

